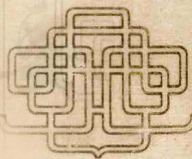


中國哲學史綱要





中國哲學史綱要



上海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
中國哲學史組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封面题字 周慧珺

中国哲学史纲要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中国哲学史组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书号 2074·349 定价 1.00元

编者的话

本书最初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哲学史组的教师和研究生、部分学员以及求新造船厂、东方仪表厂、上海船厂等单位的工人业余作者参加编写，最后由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冯契、丁桢彦、曾乐山等同志通稿，历史系曹伯言同志也参加了部分通稿工作。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对中国哲学史中的许多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书中论述的问题在不少方面还很不成熟，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前 言

——“四人帮”篡改中国哲学史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四人帮”对哲学和哲学史一窍不通，却打出“评法批儒”的旗号，妄图把中国哲学史篡改成儒法斗争史，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叛徒江青胡说：“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贯串这个斗争。”“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攻击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反革命别动队梁效和罗思鼎等，紧跟他们的黑主子，宣扬先秦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并宣称要“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来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歪曲哲学史以进行反党活动的黑文，还出版了标榜“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哲学小辞典和中国哲学史论著，把一部中国哲学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彻底清算“四人帮”篡改中国哲学史的罪行，还中国哲学史以本来面目，是哲学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战斗任务。

一、“四人帮”反对以阶级斗争理论为 哲学史的指导线索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四人帮”鼓吹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正是公开对抗列宁的教导，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

“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用超阶级概念来代替阶级概念。他们否认儒法斗争特定的阶级内容和特定的历史含义，把“儒”和“法”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永恒存在。并说：二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则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他们不仅臆造了一部儒法斗争史，并且把主观臆造的儒法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同哲学斗争完全等同起来，把中国哲学史篡改成儒法斗争史。

从理论上说，“四人帮”完全搞乱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哲学斗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离开具体的阶级斗争来谈论儒法斗争，并简单地在政治路线斗争和哲学斗争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这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为了粉碎“四人帮”的“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的鬼话，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分析每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并具体分析政治路线斗争和哲学斗争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矛盾。在夏、商和西周奴隶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表现为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当时并没有什么儒法斗争。到了春秋战国、即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开始确立的时期，才出现儒法两个学派、也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斗争。以孔丘为首的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维护奴隶制，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尽管儒法斗争在当时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古今”、“礼法”之争，但它并不能包括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所反映的思想斗争。当时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例如，我们认为，墨家代表自由平民阶级，在哲学上也属于朴素唯物主义阵营。道家代表破落奴隶主阶层，虽然属于唯心主义阵营，但其中《老子》一书却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些复杂的情况，都应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具体考察，决不能以儒法斗争这个模式去生搬硬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陈胜、吴广起义标志着农民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自此以后，历次较大的农民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路线，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哲学领域，表现为农民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同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相对抗。例如，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战斗号召，包含着反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董仲舒后来便针对这个革命思想鼓吹反动的“奉天而法古”的神学唯心主义。宋代理学家把封建等级制度说成是永恒的先验的“天理”，农民起义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并说这才是“善

法”。可见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四人帮”说什么农民起义为法家路线“开辟道路”，还说什么儒法斗争贯串到农民起义运动之中，这是公开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谬论。

同时，“四人帮”还胡说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儒法斗争、即“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路线斗争”，这也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自西汉以后，面对着农民阶级的越来越厉害的斗争，封建统治者采取了“文武并用”、“王霸道杂”的两手策略，即既用法家的刑法、武力镇压一手，也用儒家的德教、假仁假义一手，这已是儒法合流代替了儒法斗争，只不过为了愚弄人民，统治者往往实行“外儒内法”，公开打的是“独尊儒术”的旗号。当然，地主阶级内部也有反对派。如王充，写了《问孔》、《刺孟》，被正统派儒家视为“异端”，但他讲“治国之道”应是“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这显然是儒法的糅合，同董仲舒所宣扬的德教与刑罚“其事异域，其用一也”，并无原则上的差别。又如王安石，是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但他的基本态度也是“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兼用儒法两手策略。他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虽具有抑制大地主兼并的作用，却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而是要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防止象“汉之张角、唐之黄巢”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内部，虽然存在着派别之争，但不可能出现反对封建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斗争。

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内部，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如王充反对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范缜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王安石、王夫之、戴震等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等。这应该怎样解释呢？恩格斯在谈到欧洲近代哲学的发展时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

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①。同样道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前进，离不开自然科学和农业、手工业的进步。王充等人都很注意吸取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和关心物质生产，所以他们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能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当然，由于这些哲学家大多属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因而对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土地兼并有所不满，这也是促使他们敢于面对现实而倾向唯物主义的一个条件。但这种不满通常不可能发展到反对封建主义的地步，相反，在这些哲学家身上，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矛盾。地主阶级早已是反动的了，它阻碍着科学和唯物主义的进步。只是由于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所以归根结蒂，哲学发源于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

至于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就更谈不上“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不同时期的路线斗争是这个主要矛盾的不同表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之外，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反对改良派的斗争，都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哲学领域，表现为机械唯物论同儒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表现为共产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党的革命路线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反映到共产党内还表现为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则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这里，政治路线斗争和哲学斗争确实是密切联系着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间简单地划一等于号。例如，在唯心主义阵营中还有宗教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某些唯心主义者和宗教徒在政治行动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因此，对历史上的思想斗争，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

二、“四人帮”肆意践踏哲学史上的 “两个对子”

“四人帮”鼓吹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来编写中国哲学史，反对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性的线索，完全抹杀了哲学史的特殊矛盾，篡改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①什么是哲学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呢？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②哲学史就是这两个对子的发展史。“四人帮”把中国哲学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各有其特点，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有其先驱者传下来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前提。这些既有的思想资料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的。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普遍的根据或普遍的原因。但是各种意识形态如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还各有其特殊的矛盾作为其特殊的根据。不研究哲学的特殊的矛盾，就不能确定哲学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的本质，就不能发现哲学史的特殊规律。

“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胡说必须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才能“揭示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他们自称要“以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为基本线索，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著作和历史事件逐个地进行研究和评价，为编写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等创造条件”。他们究竟进行了什么“研究和评价”，揭示了什么“中国哲学史的规律”呢？无非是虚构了一部儒法斗争史，捏造了非常荒唐的“儒家 = 唯心论、形而上学，法家 = 唯物论、辩证法”的公式，强加于历史人物、著作和历史事件，肆意篡改了哲学史上的“两个对子”，把一部中国哲学史糟蹋得不成样子。

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恩格斯早已作了科学的规定：“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四人帮”公然篡改恩格斯的原理，用虚构的“儒”“法”概念作为区分唯心唯物的标准，搞乱了哲学史上的两大阵营。例如李贽、龚自珍等，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硬说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多么丰富。其实，这两人虽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却都信佛，李贽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龚自珍说“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从心和物的关系来说，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义的。又如《吕氏春秋》，被“四人帮”定为打着杂家招牌的儒家著作，当然要归入唯心主义一类，把它说成一无是处。其实，这部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兼儒墨、合名法”，也包含着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资料。再如墨家学派，被“四人帮”定为“儒家的同盟军”、“经验主义的代表”，甚至说它“比之儒家有更大的危险性”等等。其实，墨家重视经验和自然科学，反对儒家的先验论，对先秦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诸如此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可笑的是“四人帮”还替许多皇帝、皇后戴上法家的桂冠，并作为词目收入他们控制下编出来的哲学小辞典中。汉代的高祖、吕后、文、景、武、昭、宣诸帝，唐代的太宗、武则天等，都被写成一二千字的专条，似乎连吕后、武则天都成了了不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了！

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早作了科学的规定，那是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见解。而“四人帮”却公然背叛毛主席的教导，对这个对子进行了肆意篡改，并提出了“辩证法就是搞诡辩”之类的胡说。例如名家公孙龙，据说是“法家的同盟军”，于是就成了辩证论者。固然，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等论题，探讨了个别与一般的范畴，在逻辑思维发展史上有其一定的意义。但是用“白马非马”来否定“白马是马”，却堕入了诡辩。公孙龙肯定有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指”（概念），这些“指”都是彼此分离的，这分明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来看世界，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至于“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从“白马非马”引申出“强烈的政治意义”，“要把产生于奴隶社会之中的新生的封建制和原来的奴隶制区分开来，把脱胎于旧事物中的新事物和原来的旧事物区分开来”云云。那决非主张“偃兵”、“兼爱”的公孙龙的原意，而只是表示“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的比附是多么荒唐！

“四人帮”混淆诡辩和辩证法，还可举他们推崇禅宗为例。反动文痞姚文元自称研究过禅宗的《五灯会元》。“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罗思鼎的头目在谈论这部书时曾胡说：“禅宗临济宗的和尚是流氓，会搞棒喝；曹洞宗的和尚是文氓，会写几句诗。所以，他们思想解放，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具有辩证法。”这是“流氓创业论”在哲学史上的应用。禅宗的和尚中确实有一些是流氓和文痞，“四人帮”看到他们和自己同类，所以便封他们为“思想解放、具有辩证法”等等，这是毫不足怪的。但应该指出，禅宗南宗开始兴起时，曾对传统佛教起了破坏作用，因而有一定历史意义；不过演变到后来，流氓和尚专搞“棒喝”，文痞禅师胡诌诗偈，连最起码的形式逻辑推理和论证都被抛弃了。这是对理论思维的破坏，只可说是形而上学猖獗，哪里有什么“思想解放”和“辩证法”的影子呢？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而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学习以往的哲学，从哲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就是进行这种锻炼的最好的手段。“四人帮”同鼯鼠害怕太阳光一样仇视科学、仇视理论思维和唯物辩证法，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哲学史上的“两个对子”篡改得不成样子。

中国哲学史作为“两个对子”的发展史，也经历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有特别悠久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传统，曾形成两个发展的高峰：一是战国，一是明清之际。这是很可宝贵的遗产。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中国的先进人物向西方寻求真理，输入了西方的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但由于资产阶级的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软弱，所以机械唯物论在中国未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到了“五四”，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哲学史便达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的空前的大革命。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本来是各自独立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类认识史的最高成果，从它的“流”来说，是从西方哲学史发展出来的。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标志着东方与西方的哲学史已汇成统一的世界哲学史。

当然，中国哲学史上“两个对子”发展的特殊规律，需要我们研究、再研究，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仍是很肤浅的。但首先必须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四人帮”“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三、影射史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历史渊源

“四人帮”篡改历史、篡改理论，当然决非学术问题，而是服从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四人帮”把中国哲学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是他们的影射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把握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关系，揭示出哲学史如何体现理论思维的发展规律，有助于

提高人们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能力。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古为今用”。而“四人帮”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是为了他们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把虚构的儒法斗争的模式强加于中国哲学史，反对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性的线索，肆意篡改哲学史上的“两个对子”，并随心所欲地伪造史料，以古喻今，大搞影射比附，大造反革命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这种凭主观模式来塑造历史的影射史学，从思想路线来说，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是影射史学的哲学基础。“四人帮”没写过什么哲学著作，但在他们搞影射史学和其他大量的反革命言论与行动后面，也有一个反动的世界观在指导着，这就是主观唯心论。“四人帮”的主观唯心论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公开宣扬：“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写历史，七分真三分假。”在“四人帮”看来，凡是适合于他们反革命“实用”的就是真理，历史可以百分之百地进行伪造，所谓要保留的“真”，也是为了欺骗群众。实用主义者胡适说过：“历史实在是一个很顺从的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四人帮”玩弄历史涂抹术，比之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四人帮”的主观唯心论还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和非理性主义的特征。他们以帮派意志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而这个帮派意志就是要向无产阶级夺权。因此，他们从主观出发，把历史也说成是儒法两家的夺权斗争，并吹捧法家“有反潮流精神”，“不怕杀头和坐牢”，还胡说“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创业的人都要有霸气，还要有点邪气”等等。总之，历史被描绘成是由一些敢于胡作非为的流氓凭主观意志创造的，根本无所谓客观规律。

这种实用主义和唯意志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当然并非“四人

帮”的发明创造，而是古已有之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叛徒江青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发迹的，他们那时都是蒋介石的门徒，信奉蒋介石的法西斯哲学。当时在西方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宣传实用主义，希特勒提倡鼓吹“权力意志”的尼采哲学。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被贩运到中国，便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儒法合流的传统结合起来，并明显地具有青红帮流氓的色彩。蒋介石所谓的“行的哲学”，就是这种杂拌的货色。“四人帮”不过是继承蒋介石的衣钵罢了。

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西方法西斯哲学的来历，只指出在对待中国固有的儒法传统上，“四人帮”和蒋介石在表面上有一点不同。蒋介石虽也说要建立一个“法治的权力国家”，但更多的是鼓吹“儒道立国”。而“四人帮”却公开打着法家旗号，大骂儒家。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一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孔孟之道已被批臭了；二则按照传统的“逆取而顺守”的说法（在夺取权力时要用诈力、霸道一手，而在保住权力时则要用德教、王道一手），“四人帮”作为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要复辟，要篡党夺权，正处于“逆取”的地位，所以他们要向法家学习，不是学习先秦法家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的朴素唯物论，而是学习他们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法家很强调“势”。慎到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就是说，权势决定一切，用不着智慧、科学。这是很配“四人帮”胃口的论调。法家还讲究“术”，即如何搞阴谋、弄权术。姚文元在谈到《韩非子·说难》时曾胡说：“韩非提倡玩弄权术、说假话，是讲究说话的艺术，表现了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策略的灵活性。”“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甚至说：“一部二十四史，我看看去就是两个字：权术。”“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力意志”和实用主义的流氓

策略，显然是同法家讲霸道、权术一脉相承的。

“四人帮”虽然大骂儒家，其实也同时继承了儒家的反动货色。在中国哲学史上，唯心论的老祖宗正是孔丘和孟轲。而“四人帮”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革命搞好了，生产好不好没关系”之类的论调正是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唯心论滥调的翻版。特别是搞比附、影射，无非是利用或捏造一点表面现象的相似之处，进行比附，这也正是董仲舒之流最惯用的形而上学方法。董仲舒治《春秋》，强调“王其比，偶其类”，利用历史来比附现实。他还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认为可以用自然现象来比附人事，发生天变灾异，就是预示要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唐山大地震时，反动文痞姚文元从太平天国《地震诏》中摘出“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等句，并写黑诗说：“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炼，意志更坚。”“四人帮”认为山崩地裂正是“改朝换代”的预兆，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眼看着就要到来，他们的反革命“意志”更坚决了。但是历史规律是无情的，形而上学的比附方法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终究挽救不了“四人帮”的灭亡！

总之，作为“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哲学基础的主观唯心论，从其历史渊源来说，既包含有法家的糟粕，也吸取了儒家的反动货色。“四人帮”宣称“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贯串这个斗争”，实际上他们正继承了历史上的儒法合流的反动传统。我们要彻底清算“四人帮”把中国哲学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的罪行，还中国哲学史以本来面目，使中国哲学史成为回击“四人帮”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古为今用”。

一九七八年一月